

中国昌 / 主编

新理念、新领域与新范式

——周洪宇与教育文化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理念、新领域与新范式

——周洪宇与教育文化研究

●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理念、新领域与新范式——周洪宇与教育文化研究/申国昌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622-8410-9

I. ①新… II. ①申… III. ①教育学—文化学—研究 IV. ①G40-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9865 号

新理念、新领域与新范式

——周洪宇与教育文化研究

©中国昌 主编

责任编辑:史小艳

责任校对:肖绪旭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电话:027-67867792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press.ccnu.edu.cn>

电子信箱:press@mail.ccnu.edu.cn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字数:861 千字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8.25

版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15.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本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编：申国昌				
	委：操太圣	周小方	周险峰	闻洁	张桂霞
	涂怀京	朱新梅	李伟	(华中科大)	李高峰
	但昭彬	陈竞蓉	陈峥	广少奎	胡志坚
	郭娅	赵厚颀	肖会平	汪楚雄	王晋丽
	陆克俭	丰春光	胡崇芝	陈功江	蔡幸福
	张明武	耿红卫	朱红梅	樊艳艳	郭余欢
	胡红乔	陈光春	李雪	于文哲	刘来兵
	喻永庆	赵永利	李永	黄宝权	李浩泉
	李忠	刘训华	刘大伟	张建东	程永洲
	于洋	宋俊骥	鲍成中	李艳莉	徐莉
	袁海霞	李木洲	魏珂	易凌云	蓝日模
	赵国权	周娜	黄亚栋	邓凌雁	龚苗
	王配	付睿	侯耿耿	胡佳新	陈诗
	王文虎	齐皓	丁水娟	戴明	邢欢
	李中伟	刘佳	李伟	(华中农大)	张汉敏
	戚同欣	范青青	齐彦磊	李鹏	

前言

师从洪宇老师学习、研究与工作已有 15 载，在这 15 年当中，我作为学生见证了他在事业与学术上的快速发展。2003 年他当选全国人大代表，2006 年任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2007 年任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2008 年至今担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6 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2017 年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战略学会副会长，2018 年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一方面，他积极建言献策，不断推动各项重要教育政策与法律制度出台，推进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他所提的教育政策建议如“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义务教育教科书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实行国家教育公务员制”等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他潜心研究，成果颇丰，尤其在陶行知研究、教育史学研究、教育政策研究和教育理论等方面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引领学术与学科发展走向，其成果多次荣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我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学术原创奖”。先后荣获“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基础教育影响力人物 30 人”、“当代教育名家”等称号。

洪宇老师向来以勤奋、睿智、严谨、执着而著称。无论在哪里任职，无论任什么职，他都要干出成绩，不达目标不罢休。尽管身兼数职，但他始终将研究与育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常讲：“教育是我的至爱”、“学问是安身立命之本”。因此，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并颇有建树。

首先，在科学研究方面，洪宇老师多年来先后在陶行知教育思想、教育思潮与流派、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育活动史、教育生活史、教育身体史、教育情感史、教育旅行史、教育口述史、教育记忆史等教育史研究领域，在教育公平、区域教育、教师教育、“生活·实践教育学”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均取得丰硕而辉煌的成果，共出版专著 29 部、合著 14 部、编著 4 部，主编单册著作 21 余部，主编丛书 142 本，发表各类文章 470 余篇，其中学术论文 200 余篇。

其次，在人才培养方面，洪宇老师从 1993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1 年招收博士研究生，2009 年招收博士后，至今已培养研究生 60 余人，遍布 18 个省，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云南、贵州等地都有周门弟子。弟子中有校长、处长、院长、社长、教授、博导等，其中校领导 2 人、教授 15 人、院长或处长 16 人。

再次，在社会服务方面，近年来，洪宇老师在资政建言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在义务教育学杂费免费和教科书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建立校车安全体系、建立教育公务员制、实行教师流动制、加快教育立法、制定国家统一法、修改立法法、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制定长江保护法、制定湿地保护法以及实施中部崛起、长江城市群发展等众多领域提出了 320 多条议案建议,大部分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在从政服务方面,先后任副区长、副局长、副厅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在每个岗位都能尽职尽责,本着“工作研究化,研究理论化,理论实践化”的宗旨,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智库建设方面,2006 年他发起成立了长江教育研究院,为国家教育决策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参考建议。在指导基础教育方面,2003 年成立阳光教育研究院,全国有 300 多所中小学加盟,形成了“生活·实践教育学”实践体系。

最后,在文化遗产方面,洪宇老师主编了“中国教育的传统与变革丛书”(6 册),深入挖掘与梳理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与变革经验。2017 年出版了《炎黄国祭论》,2018 年出版了《炎黄精神论》,传承炎黄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目前,他正组织编撰“文庙研究系列丛书”,并向国家提出文庙研究及保护的系列建议。他在文庙保护、图书馆、博物馆建设、匾额文化重建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同时开展相关研究。

洪宇老师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主要是他拥有以下优秀品质:执着的事业追求、过人的智慧智商、勤奋的治学精神、敏锐的学术眼光、开阔的学术视野、超强的自控能力、豁达的人生态度、真诚的待人之道、宽容的交往之道、科学的时间安排、高效的工作节奏、卓越的领导能力等。

2018 年,是洪宇老师花甲之年。弟子们提议,对导师在教育与文化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阶段性梳理,并编辑成册,以作纪念。因此,本书主要分“研究综述”、“师门杂议”、“著述读后”、“附录”四大部分。其中“研究综述”分为学术研究体系总论、陶行知研究、教育史学研究、文化与文明史研究、教育政策研究、生活·实践教育学研究六部分。“学术研究体系总论”,主要收入周洪宇的“活动·实践”研究系统评介、大学教授的社会使命与担当——基于周洪宇教授的成长经历及周洪宇的人生观、政治观、历史观、教育观、治学观、知识图谱的文章;“陶行知研究”,主要收入周洪宇与陶行知研究、周洪宇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践、周洪宇与陶行知研究的国际化、周洪宇与陶行知教育学说的当代价值研究、周洪宇与陶行知等东南地区教育家群体研究、周洪宇与教育实验史研究的文章;“教育史学研究”,包括周洪宇与教育活动史研究、周洪宇与教育生活史研究、周洪宇与教育身体史研究、周洪宇与教育情感史研究、周洪宇与教育记忆史研究、周洪宇与教育口述史研究、周洪宇与教育旅行史研究、周洪宇与当代中国教育史学四大流派、周洪宇与教育史学科建设等内容;“文化、文明史研究”,包括周洪宇与炎黄精神研究、周洪宇与文庙学、周洪宇与文庙保护及研究、周洪宇与图书馆教育史研究、周洪宇与博物馆建设、周洪宇与匾额文化重建的内容;“教育政策研究”,收录的主要内容有周洪宇的教育公平论、周洪宇与义务教育免费和教科书免费、周洪宇与教师教育研究、周洪宇与全国校车体系的建立、周洪宇与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周洪宇与大学生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周洪宇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及其教育应对研究、周洪宇对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的研究与推动、周洪宇与教

育立法、周洪宇与教育智库研究、周洪宇与长江教育研究院、周洪宇与世界顶级期刊《科学》面对面；“生活·实践教育研究”，包括周洪宇与“生活·实践教育学”、周洪宇与阳光教育。“师门杂议”，主要收集了洪宇老师众弟子的求学回忆文章；“著述读后”，包括陶行知研究，教育史学研究，文化、文明史研究，教育政策研究栏目；“附录”，包括周洪宇教授著作要目和学术论文要目。

本书收录了洪宇老师指导的部分已毕业的历届博士生但昭彬、广少奎、胡志坚、郭娅、赵厚颀、申国昌、陈功江、蔡幸福、张明武、耿红卫、汪楚雄、陈竞蓉、陈光春、刘来兵、喻永庆、李永、黄宝权、李浩泉、刘大伟、张建东、程永洲、于洋、宋俊骥、鲍成中、李艳莉、徐莉、魏珂、易凌云、蓝日模、赵国权、周娜及在读博士生黄亚栋、邓凌燕、王配、付睿、侯耿耿、胡佳新等的文章、书评或回忆文。有他指导的博士后李忠、刘训华、李木洲等及曾指导过的硕士周险峰、胡崇芝、陈峥、龚苗、陈诗等撰写的文章。

由于此书是对洪宇老师在教育与文化领域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初步梳理，再加上时间仓促，因此，书中不完善与不完美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申国昌

2018年8月8日于桂子山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2018年1月16日在60诞辰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感谢各位厚爱，冒着严寒专程来汉参加这次“新时代教育研究前沿”学术研讨会！感谢筹备组各位同志在国昌的统领下为筹备这次活动付出的大量时间和心血！我和张老师为你们的无私奉献表示衷心感谢！更为你们的茁壮成长和骄人成就感到欣慰和自豪！

1997年至2017年这20年是我迄今为止人生中最美好、最丰盛的20年。我在此期间有幸结识了各位，与大家一同探讨，一同努力，一同进步。这20年来个人所取得的若干进步，都是与大家共同奋斗拼搏的结果。感谢各位这20年来的不离不弃和全力支持！

说实话，对于这次活动，个人开始是抵触与排斥的，并不想搞，因为担心它会走样，太高调，违反有关规定，既给大家添麻烦，耽误时间，耗费精力，还被人说闲话、抓辫子，张老师尤其反对。后来国昌等人做工作，说一定不大张旗鼓，不收礼也不吃请，重点放在学术探讨、研究未来发展上。我才下了这个决心，有了这次活动。为此，我与国昌在筹划初期就确定一个原则，为个人祝寿不是目的，共同探讨才是主旨，欢聚一堂、聊天叙旧不是初衷，团结起来、开拓未来才是追求。所以，这次活动的重点要放在探讨新时代教育研究者特别是我们华中团队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为国家学术事业和教育改革发展做出新贡献上。我们要把它办成一个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活动。按照既有安排，今天上午张老师与部分同学集体骑车畅游了东湖绿道，欣赏了武汉的美景。刚才几位外地同行在前面表达了贺意，现在我做个发言，算作答谢，同时简略回顾一下60年人生历程，谈点个人对未来发展的思考，先抛砖引玉，然后请大家发言，以便集思广益，博采众长，重新出发，再上层楼。

关于个人60年的经历与当下的心情，我想用一首刚刚现场草就的打油诗来做概括：“六十初度月正圆，廿载岁月非等闲。幼年与国共时艰，青壮恰结改革缘。而今迈入新时代，海阔天空一帆悬。老夫再发创业愿，花甲之时正当年。”从这首打油诗里可以看出，个人这60年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可谓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共时艰，同沉浮；共欢乐，同进步。为了简略分析，我把自己这60年大致分作三个阶段，各20年：第一个20年，也就是1958年至1977年，这是国家“经历艰难、曲折坎坷”的20年，也是个人“与国共艰、不甘消沉”的20年；第二个20年，即1978年至1997年，是国家“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20年，也是个人“发奋图强、崭露头角”的20年；第三个20年，即1998年至2017年，是国家“加速发展、后来居上”

的20年,也是个人“探索创新、有所作为”的20年。这第三个20年里,个人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说实话,个人的努力虽然很重要,但更多地得益于时代所赋予的条件、机遇与平台,得益于组织的培养重用、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尤其是近20年来,与在座各位的共同切磋以及鼎力相助是密不可分的。我要借这个机会向各位再次表示个人由衷的谢意!

回顾起来,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近20年,我主要做了些什么呢?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可以说:“教书育人作研究,参政议政谋国是。”具体地说,一方面,在学校当老师,教书育人,从事研究。另一方面,又先后在政府与人大从事行政实务,从一个特大中心城市的基层干部成长为一名省领导;还担任省级民主党派主委,带领五千多名民进成员履行参政党职责;同时担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换句话说,这20年是一身而五任:既是大学教师,又是智库学者,既是机关干部,又是党派主委,还是人大代表,每天都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环境、背景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事不同的工作,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由于一身兼五职,故常有心力交瘁、力不从心、顾此失彼之感。这种体会,非常人可以感受,只有个人如鸭饮水,冷暖自知。

今天我想重点谈谈这20年个人在学术上已经做了什么,未来计划怎么做,供大家参考。总括起来,这20年个人在学术上主要做了五件事,一是培养人才,建立华中研究团队;二是探索创新,努力创建陶行知学和教育史学新体系;三是从事现代化与文化、文明史研究,努力打通现代化与文化史、教育史的联系,使文化现代化有新生长点,也使教育史有新的高度、厚度和宽度;四是组建教育智库,开展教育政策研究,积极建言,推动教改;五是开展基础教育实验,探索新型教育理论。基本思路是:回溯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打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联,为中国教育和文化现代化找出路。

首先,从人才培养看,如果不算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为华中师大教育学院多届本科生系统讲授中国教育史课程的成百上千名学生,也不包括个人参与指导的院系所其他导师的数百名硕士生,仅从1992年后个人开始独立指导的硕士生算起,至今已经培养近二十名硕士生(包括操太圣、周小方、张桂霞、涂怀京、闻洁、李高峰、陈竞蓉、王晋丽、汪楚雄、丰春光、胡崇芝、郭余欢、胡红乔、李雪、于文哲、龚苗、陈诗等),博士生有四十余人(包括但昭彬、胡志坚、广少奎、郭娅、肖会平、赵厚颢、申国昌、陆克俭、陈功江、张明武、耿红卫、蔡幸福、汪楚雄、朱红梅、樊艳艳、陈竞蓉、陈光春、刘来兵、喻永庆、赵永利、李浩泉、李永、黄宝权、刘大伟、张建东、程永洲、宋俊骥、鲍成中、于洋、徐莉、李艳莉、魏珂、蓝日模、易凌云、赵国权、周娜、邓凌雁、黄亚栋、王配、付睿、侯耿耿、胡佳新等);博士后有李忠、刘训华、李木洲、袁海霞4位,访问学者有齐皓、丁水娟、王文虎以及戴明等多位,今年又招了2位硕士生(范青青、戚同欣)、3位博士生(刘佳、李伟、张汉敏)、2位博士后(邢欢、李中伟),估计在75人左右吧。这个数字比起本校资深教授或其他知名教授,可能不算太多,但令人欣慰的是,学生们毕业后已有不少人在多个学术领域

开始挑大梁、当主角了,有的还担任了大学校长、院长、处长以及政府的局长等。目前华中研究团队已经建立起来,成为国内教育史学界一支富有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起着一定引领作用的重要力量。从学科带头人、科研队伍实力、研究领域及其标志性成果看,目前华中研究团队在教育史学领域和教育智库领域已经建立了可以与国内多所名牌大学相媲美的地位。而在陶行知研究这个教育史学细分领域,可以自豪地说,论开展时间之久、参与人员之众、培养人才之多、学术成果之丰、获奖次数与成果外译之多、产生影响之大,华中研究团队都可算当之无愧的头雁。

二是探索创新,创建陶行知学和教育史学新体系。在创立陶行知学方面,个人自觉向史学大师章开沅先生学习。他老人家立志并做到了将辛亥革命史研究引进中国,又将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我也发愿努力将国外陶行知研究引进中国,将中国陶行知研究推向世界。通过三十余年的努力,这个目标也基本实现了,初步创建了陶行知学。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末个人读博士期间就广泛搜集整理世界各国陶行知研究成果,1991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译出版了40万字的《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分别介绍了美、英、德、法等国知名学者费正清、孔飞力、朱宥潜等人和日本、韩国知名学者斋藤秋男、牧野笃、中野光、小林光一和禹龙济等人的陶行知研究成果,拓展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促进了中外学术的交流。2017年,又在原书的基础上扩充,增补了一倍篇幅,编译出版了该书的80万字的新编本。与此同时,还组织多位博士在此基础上编译出版了近400万字的“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丛书”(八卷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将世界各国陶行知研究的最新成果汇编成册,奉献给国内研究者,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另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个人从大学历史系一毕业就参与编辑《陶行知全集》(六卷本)工作,先后参与编辑出版多种陶行知全集和各类专辑文选。在此基础上,个人以陶行知研究为专题,撰写了与此相关的国内第一篇教育学硕士论文和第一篇历史学博士论文,于1985年和1991年先后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和历史学博士学位,相继出版了《开拓与创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人民之子陶行知》、《陶行知大传:一位文化巨人的四个世界》等专著,主编出版的《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旧、新编本),与刘大伟合著的《陶行知年谱长编》(三卷本)也即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专著《陶行知学通论》、《陶行知新论》等也已完成初稿,正在修改之中。近几年,我的工作重点是將陶行知研究推向世界,为此,先后编译了《世界教育大师:陶行知》和《生活教育——陶行知英文著作精选》(中英双语本),其中 *Life Education—Selected Readings of Tao Xingzhi's English Works, Changing the World through Education: the Life of Tao Xingzhi* 两本书已由美国时代出版公司于2016年和2017年先后出版,专著《陶行知教育学说》的英文版近期也由美国时代出版公司出版,努力将中国的陶行知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向世界各国人民介绍中国大教育家陶行知的思想和实践,让中国教育思想成为人类思想宝藏的一部分,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赢得教育上应有的话语权。目前个人还兼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陶行知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和中国陶行知研究院院长。

在构建教育史学新体系上，我采取理论与实践探索两条腿同时走路的方式，基于1985年文化研究中提出的“活动”概念，1996年后开始提出“活动·实践史观”教育史学理论，力图打通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注重对教育历史过程中人的活动的研究，重建教育活动历史实践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内在逻辑与关系，注重现实教育实践对教育活动历史的回应。在教育史研究上开辟了教育活动史研究新领域，使之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并列，拓展了教育史研究的空间，重新构建了教育史学学科体系。积极倡导整体史学观，打通近代、现代、当代；倡导教育史学元研究，构建教育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新框架，推动教育史学学科理论建设。近年来呼吁教育史学要努力做到“两个回归”，即教育史学应回归历史学的主体和国际历史学、教育史学的主流，主张教育史学研究应借鉴史学分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日常史学、历史人类学、身体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形象史学、影视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开拓教育生活史、教育身体史、教育情感史、教育旅行史、教育记忆史、教育口述史、文庙学等新领域，这些都引起了国内教育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和积极响应。围绕建立教育史学新体系这个目标，近年出版的相关著作有：《创新与建设——教育史学科的重建》、《学术新域与范式转换——教育活动史研究引论》、《多样的世界——教育生活史研究引论》、《文化与教育的双重历史变奏——周洪宇文化教育史论》、《不朽的文华——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大学图书科到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还主编了《教育活动史研究与教育史学科建设》、《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船工之子与教育大师——牧口常三郎的教育活动》、“教育史学研究新视野丛书”（10册）以及“中国教育活动史专题研究丛书”（第一辑和第二辑，共20册）等，尤其是以华中团队骨干为主、吸收国内有关高校教育史专家参加编撰的、被教育史界权威们誉为“十年磨一剑”的八卷本、460万字的《中国教育活动通史》，2017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一出版就获得2017年度《出版人》“好书推荐”的2017年度“超级榜”中全国教育类图书（两部中的一部），这是华中研究团队通力合作的最新成果，被专家评为“国内近二十年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标志性重要成果”。个人现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会长和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

第三是从事现代化与文化、文明史研究，恢复与打通文化史与教育史的联系，使文明史有着力点、生长点，也使教育史有新高度、新厚度、新宽度。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攻读教育史硕士生开始，就已经介入现代化与文化、文明史研究了。我们这一代人受当时“文化热”（实际上是“政治热”、“现代化热”）的影响，喜欢读李泽厚、庞朴、汤一介、朱维铮、刘泽华、金观涛等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与现代化、文化史、文明史的著作。当时几乎每个大学生的书架上都放有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史论》、《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哲学述评》、《走我自己的路》等。我热衷于研究传统文化，但当时研究的取向与现在注重继承与弘扬的进路正好相反，着力点在找到现实政治中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以批评现实政治，推动现代化。个人还立志创建一门囊括众学、居于诸学之上的“文化学”，勤学苦读，发奋用功，撰写并发表了《关于文

化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化系统论纲》等论文，还发表了《深刻的片面与肤浅的全面》一文，引起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关注。近20年来，个人对现代化、文化史、文明史的研究一直没有忘怀，近年来又与人合作研究中华文明早期源流史（重点是炎黄），合作撰写《炎黄学导论》、《炎黄国祭论》、《炎黄精神论》等专著，研究炎黄及其对中华文明发生学的影响，并探讨这种影响的现代表现，着力于中国传统文化、文明的“再生性创造”，先后提出炎黄是中华文明的“共同人文初祖”与最早的“文化英雄”，提出炎黄文化流变的“四期说”（前轴心时代、轴心时代、轴心后时代、新轴心时代），提出中华文明史不同时期文化创造主体“转换说”，提出中华精神的“一个质点、三个圈层”的“结构圈层说”（炎黄精神是中华精神的质点硬核，此后不同时期，围绕它层层加大，形成圈层结构，成为今天的中华精神），提出以中华精神为基础和本质的“合实力说”，努力使中华文明、中华精神的研究致力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之用。努力恢复与打通文化史与教育史的联系，使文明史有着力点、生长点，也使教育史有新高度、新厚度、新宽度。将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成果横向迁移到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上，争取有机会重写《中华教育史》。

第四是在组建教育智库、开展教育政策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推动教改方面，个人以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工业革命为宏观背景，以教育公平为重点，多年来大力倡导义务教育免费论、基础教育均衡论、高等教育创新论、职业教育发展论、教师教育转型论、区域教育协调论、终身教育建构论、教育体制改革论、教育决策民主论、教育投资加大论等，通过全国人大、民进中央、教育部的各种会议及其他途径积极建言献策，推动了中国教育多项重大现实性战略问题的解决。2003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向温家宝总理当面提出“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学费、杂费、教科书免费）”建议，2016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又向分管教育的刘延东副总理提出学前幼儿基本阅读免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午餐免费和逐步实行高中阶段学生学杂费免费的“新三免”，以及建立全国校车安全体系、完善高校学生助学贷款制度、建立大学生医疗保障体系、建立义务教育阶段公立中小学教师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和国家教师荣誉制度等政策建议。2006年12月，领衔建立国内最早的教育智库之一——长江教育研究院，致力于教育智库、教育治理、教育决策的研究，提出“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的主张，在全国智库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教育政策学领域，主要著有：《智库与治理——周洪宇国是建言》（上、下卷）、《教育的信念与追求》、《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教育公平论》、《教师教育论》、《中部教育论》、《大时代：震撼世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周洪宇谈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教育转型》、《乐为教育鼓与呼》等。特别是最近主编出版的14册、350万字的“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一经出版便广受关注。与此同时，还组织编写“全球教育治理研究丛书”（14册）、“全球教育智库研究”（14册）、《全球教育智库概览》等。此外还著有《怎样做人大代表》、《怎样写人大议案》等。2016年12月，长江教育研究院成功入选首批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在社会智库内MRPA测评综合排名中居全国第三（国内教育类第一名），MRPA资源效能测评排序

中居全国第一；2017年继续入选首批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在社会智库内MRPA测评综合排名中居全国第三（国内教育类的第一名）；还入选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估研究院“高效合作类教育智库”前六名。个人位列智库专家MRPA测评综合排序中全国第2名，同时兼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智库联盟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光明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第五是开展基础教育实验，探索中国基础教育新模式。在教育实践领域，开展“阳光教育实验”，努力构建“生活·实践教育论”。从2003年开始在武汉市第二十五中学启动开展阳光教育实验并逐步扩展到外省中小学。经过近15年的探讨，建立以“生活·实践”为逻辑起点的“生活·实践教育论”，探索基础教育新模式，在中小学产生了积极影响。“生活·实践教育论”是以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教育学为理论基础，参考借鉴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和积极心理学理论，以生活为内容、实践为途径、“生活·实践”为逻辑起点，以真善美价值理念为核心，以造就“德智体美合实”全面发展的人为最终目的的教育。特别需要指出：这里的“合”指“合育”（合和教育），“实”指“实育”（实践教育）。“生活·实践教育论”可以概括为“一个宗旨、两个重点（两个目标）、三大领域和三商并举、四个特征、五全理念（五大法则）、六育并举、七大行动、八大经验、九大转变、十大主张”。“生活·实践教育论”目前还在探索发展中，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与完善余地。个人在基础教育领域的主要论著有：《教育大变革——全体、全面、全程的阳光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教育大创新——阳光教育实践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阳光教育对话录》（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总体性的教育理论著作《生活·实践教育学论纲》近期有望完成。个人现在还兼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和中国阳光教育研究院院长。

这20年来，我一直主张“工作研究化、研究理论化、理论实践化”。通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努力构建一个集教育史学、教育理论、教育政策、教育实践四位一体的研究工作体系。这一体系无论是个人的历史理论（“活动·实践史观”）、教育理论（“生活·实践教育论”）、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实践导向”）、文明研究与文化政策，都以“活动·实践”为中心与主轴，努力做到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学术与应用之间的统一。

总结起来，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近20年，之所以取得上述成绩，有其原因与规律。常言道，凡事成功都有其“天时”、“地利”与“人和”。我将之概括为“五好”，即遇到了好时代，赶上了好机遇，有一个好方位，选准了好方向，有一群好伙伴。

从“天时”看，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时代，是能干事业也能干成事业的好时代。1978年以后，国内外的大环境、大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前的封闭环境产生了天壤之别。国家各方面的发展，特别是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都迫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教育学科作为知识支撑，需要教育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为国家教育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提供依据和参

考；这一时期全面对外开放的大格局让我们有机会出国访学考察，走出去看世界，既为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国际标准，也为我们的研究成果走向国门，建立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创造了良好条件。从个人际遇来看，我有幸加入民主党派，开始关注国事，参政议政，贡献智慧，进而有机会得到各级组织及领导的精心培养。1996年以后，从学校院所到政府、人大、政协历练20余年，学会并掌握了从学术之外另一个视角——社会实际看问题的能力，学会并掌握了一套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的方法，以及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统筹考虑、协同推进、分步实施、典型引路、全面推广等工作方法，这些都有助于我在学术发展上从战略高度思考问题、谋划未来，以辩证思维看待成绩与不足，以创新思维与目标导向开展和推进工作。

从“地利”来看，武汉是中国的经济地理中心、国家特大中心城市，区位优势明显，交通四通八达，以武汉为半径，一千公里范围内都只需三四个小时内车程抵达，又是中国近代经济、文化和科教发源地，经济实力排在全国前八，科教文化资源丰富，单个城市大学生人数位世界第一。在此做学问，虽无北京政治中心与上海经济中心之利，但也可避两大中心之弊，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在武汉做事，在北京发声，这是一个很好的方位。从做事方向上看，个人最早从教育史细分领域的陶行知研究做起，选择中国近现代知名教育家里最有原创性，教育成就最高，国内外影响最大，命运跌宕起伏最大，也最受教育界关注的陶行知作为研究对象，选题比较好，符合当时自己基础薄弱、选题宜小的实际。从小选题入手，切口小，进入早，动作快，挖掘深，加之持续研究30余年，成果积累丰硕，可以持续领先。此后，又由陶行知研究延伸到近现代教育家群体和思潮研究，扩展研究领域。特别是在研究教育史学过程中，发现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活动史长期处于空白状态，遂“冒学界之大不韪”，逆势打入，并在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开始指导博士生后，积极组织力量重点突破。一方面，在理论上建构新的教育史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具体的教育史学研究展开攻关，从组织推出专题博士论文系列，到组织主编出版通论性八卷本《中国教育活动通史》，积十年之功，终于奠定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三足鼎立的教育史学新体系、新格局，并通过后续相关的教育生活史、教育身体史、教育情感史、教育旅行史、教育口述史、教育记忆史、文庙学等新兴细分研究领域的拓展，既使教育活动史研究领域得以深化与巩固，又推动教育史学学科发展，并与现实教育实践衔接，推动现实教育改革，打通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联。而在国内率先开展的教育智库研究，更是个人近20年“参与史学”、“经世致用”理念的进一步体现。从研究方向上看，始终与“活动·实践”相连，顺势而为，与时代同行，以学术为本，为改革奉献。

最后，从“人和”看，我有一群好伙伴，平生遇到了几位好的人生和事业导师（包括家父周华狄，本科生老师张舜徽、章开沅、吴量恺、熊德基、王瑞明、涂厚善，硕士生导师董宝良，章开沅先生后来还担任我的博士生导师），遇到了赵军、马敏、朱英、桑兵、虞和平、王杰、马小泉、郭国灿、乐正、莫世祥、张富强、宋亚平、游

建西、彭南生、王玉德、刘伟、熊贤君、余子侠、王奇生、何建明、张艳国等一批才华横溢、智慧超群的博士生同学，以及博士同学中的政界精英潘岳、李宪生、李智勇等，后来又遇到了教育史学界前辈高时良、江铭、孙培青、王炳照、熊明安、吴式颖等，教育史优秀同行田正平、丁钢、张斌贤、杜成宪、刘海峰、贺国庆、肖朗等人，以及教育学界名家顾明远、瞿葆奎、王道俊、叶澜、郝克明、谈松华、闵维方、张力、钟秉林、孙霄兵、朱小蔓、朱永新、袁振国、庞丽娟、张志勇等人，各位先生都给我以教益。尤其是2001年开始指导博士生后，又认识了各位，从而建立了一个优秀的研究团队，使我的诸多研究计划得以逐一实施，才有了现在这个局面。

总体看，华中研究团队现在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一是战略谋划和组织能力，二是判断与预见能力，三是资源整合能力，四是议政建言渠道能力，五是发表与出版能力，六是学习反思能力。但客观而言也有诸多不足，主要是：队伍建设跟不上事业发展的需要，许多想做的事不易开展；良性机制未形成以致过于依赖个人，平台和资源有限以致过于依赖外部，理论深度和厚度不够亟待加强；学术普及不广、社会大众影响有限；国际化进程推进较慢、难以适应时代需要；内部管理过于粗放不够精细，这些都制约了团队的更大发展，需要尽快改变。

十九大之后，新时代已然来临，下一步怎样发展，有哪些新目标，计划分几步走，如何实现目标？

诗人海子有句诗写得很好：“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我们与国家共同走过了高速成长的40年，未来的20年仍是可以继续实现梦想的20年，中国仍有望“高质量成长”20年以上，它也将是我们“重新出发、再次创业”的20年。前天夜读先师张舜徽先生《我治学的两种傻气》，受益匪浅。他指出，治学者欲成大事，必须要具“五有精神”（即有恒心、有毅力、有耐心、有信念、有傻气），这给我很大启发，我将之扩展为“有信念、有志向、有情怀、有恒心、有毅力、有耐心、有傻气”七种精神。对比“他者”，我们要反思不足，总结经验，明确前进方向，确立新的目标，争取在下一个10年，大家都得到更大的进步与提高，成为多个研究领域的领军人。

华中研究团队今后仍应使个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相伴随、共成长。所秉持的原则是“顺势而为，再上台阶”，总体目标为：一是建立一支更为壮大、学养丰厚、富有特色、敢于创新的研究队伍。二是在不断夯实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研究基础的同时，在教育史学的新兴领域继续深化拓展，引领学术方向，加快推进学术国际化；在陶行知研究领域做到国际公认。三是在文化、文明史、炎黄研究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及话语权。四是在教育智库研究方面，不断拓展深入，积极为国家教育改革发展建言献策，在全国教育智库界保持领先地位，加速国际化。五是在基础教育实践方面，建立更大更多的教育实验区与实验学校，形成自己的“生活·实践教育学”体系。在上述方面，都要推出具有标志性的成果。

为此，我希望各位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国昌继续协助我负责教育活动史及新的丛书的组织出版，同时协助教育智库研究，协助开展国家重大招标课题“建设教育强国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刘训华负责协助教育生活史研究，组织推出“中国教

育生活通史”等丛书；刘来兵、周小方负责教育口述史研究，组织推出“当代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等；李艳莉、魏珂等负责教育身体史研究，协助编写“教育身体史研究丛书”；周娜负责教育对话史研究，协助编写“中外教育思想名家对话录丛书”；刘大伟负责陶行知研究，协助组织“教育记忆史研究丛书”；赵国权、郭娅、广少奎负责文庙学研究，协助组织《文庙研究专题史》、《中国文庙历代资料集成》和《文庙学通论》等。大家各负其责，戮力同心，共同奋斗，再干20年，再上新台阶。

过去有句老话，人到中年万事休。这种生活态度太消极。中国过去习惯将人按年龄划分为四个阶段，29岁以下为青年组、30~39岁为中青年组、40~49岁为中年组、50岁以上属于中老年组。但是，2013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新的标准，根据各国人们的最新平均寿命，将年龄重新划分为五个阶段，即44岁以下为青年人、45~59岁为中年人、60~74岁为年轻老年人、75~89岁为老年人、90岁以上为长寿老人。新的五分法将人的衰老期推迟了15年左右，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和抗衰老意志产生了积极影响。所以，按这个标准看，我现在还属于年轻老年人，还不是老年人，还大有奔头，愿意与大家再次创业，再上台阶，为国家、为社会、为学术做出新贡献！

周洪宇

目 录

第一编 研究综论

一、学术研究体系总论	(3)
周洪宇“活动·实践”研究工作总结评介	付 睿 (3)
大学教授的社会使命与担当	
——基于周洪宇教授成长经历的思索	徐姗姗 刘训华 (18)
周洪宇的人生观	赵厚懿 (39)
周洪宇的从政观	喻永庆 (54)
周洪宇与历史观	张建东 (60)
周洪宇的教育观	鲍成中 (69)
周洪宇治学风格论	汪楚雄 (88)
二、陶行知研究	(95)
周洪宇与陶行知研究	刘大伟 (95)
周洪宇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践	丁水娟 (105)
周洪宇与陶行知研究的国际化	周 娜 (113)
周洪宇与陶行知教育学说的当代价值研究	
——基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视角	龚 苗 (119)
周洪宇与陶行知等东南地区教育家群体研究	
——以郭秉文研究为例	李 永 (130)
周洪宇与教育实验史研究	涂怀京 (145)
三、教育史学研究	(150)
周洪宇与教育活动史研究	中国昌 程功群 (150)
周洪宇与教育生活史研究	刘训华 (162)
周洪宇与教育生活史研究	
——基于文学作品的视角	于 洋 (172)
周洪宇与教育生活史研究	
——基于教育叙事研究的视角	蓝日模 (177)
周洪宇与教育身体史研究	李艳莉 (186)
教育情感史研究概说	邓凌雁 王 配 (193)
周洪宇与教育记忆史研究	陈 诗 (203)